

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

刘佐泉 著



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

刘佐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客家问题的专著，是海内外客家研究百年间集大成之作。作者除对客家起源、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作了系统的研究外，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也给予详尽的介绍。作者把客家历史与国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于论述，书中不乏新的见解。全书对客家问题阐述全面，行文流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它是人们了解客家、认识客家的实用教材，也是海外客家乡亲寻根溯源的向导。

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

刘佐泉著

责任编辑 粤梅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广东省粤西农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 / 32 印张： 字数：41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13 元

ISBN 7—81018—637—X / k · 73

序 一

史 式

友谊的发展大都是先相识，后相知。因为既已相知，必然相识；而相识者未必尽是相知。岂不闻有许多人“交游遍天下，知己无一人”乎！文字之交却是另一回事，总是未见其人，先见其文，心仪已久而尚未谋面，即虽未相识，先已相知也。相知而后见面，握手言欢，如对故人，其乐何如！我与刘佐泉同志的友谊，正是如此。两年前，有幸拜读其书稿《碧血黄花诗文钞》，深佩其功底之厚，治学之勤；以后即鱼雁常通，探讨学术，自诉平生，未识其人，已成老友。今年五月，因参加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相会于金陵，挑灯夜谈，相见恨晚。今其巨著《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定稿，索序于余，知其耗十年心血，撰成此书，案头巨帙，来之不易，故欣然命笔，略书感想，并表祝贺之忱。

先言其人。

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与刘佐泉同志之经历，颇有相同之处。简言之，相同之处有三：

一曰生不逢时，一世坎坷。

二曰皆治史学，乐此不疲。

三曰治学执著，“衣带渐宽终不悔”，“语不惊人死不休”。

刘佐泉同志是客家人，山村农家子弟，出身贫寒，当过童农、童工、小教、中教、农场场员、公社社员、机关秘书、如此等等；读书则靠奖学金、助学金、半工半读；熬到大学毕业，即遇“运动”，遭受“戴帽”，其中滋味，不言而喻。盼到归队之时，已

年近五十，去日苦多，来日苦短。故近年来发奋著书，欲遂平生立言之志也。《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是其力作。以客家人发扬客家精神而撰客家史，可谓夫子自道，其能承先启后，鉴往知来，成为传世之作，不卜可知。

再言其文。

刘佐泉同志治史，主要是客家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兼及其他方面。就我所读过的一些书稿与文章而言，深感其：

一、治学严谨，言必有据。

二、行文简洁，极少芜词。

三、研究客家史事，颇有创见。例如对客家史之分期，客家精神之形成，客家人如何保存与发扬中华文化等等问题，均有独到之见。

我不是客家人，对于客家历史虽然略作涉猎，而所知甚少，尚未入门。但是对于根在中原大地如今遍布世界的几千万客家人的由来与发展，深感兴趣，愿加探讨。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民族性自有其长处，否则不足以长期屹立于世界，而保有广土众民；但是无可讳言，我们民族性中亦有短处，如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缺少开拓精神等等。而中华儿女中的一部份——客家人——却在长期迁徙、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长处，而扬弃了短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他们先在国内逐步南迁，南宋以后，又成批地移居海外。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和平的移民，所至之处，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只有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才能立足，才能生存。生存之后，再谋发展，千年岁月，万里征途，大浪淘沙，优胜劣败，他们经过艰苦奋斗，长期迁徙，终于抛弃了安土重迁的旧习，勇敢地走向世界各地，锻炼出一种坚毅不屈的客家精神。他们的生命力之强是惊人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一坯土，一瓢水，他们就能活得下来，建立家园，开创事业。由于客家精神的熏陶，客家子弟多能艰苦奋

斗，在许多经济事业中出人头地，在许多学科领域内名列前茅。

我认为：每一个对全世界有重大贡献的民族都应该走向世界，而不能株守一隅。海外华人——其中相当部份是客家人——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先驱之一。他们久经锻炼，百炼成钢，正是我们民族的精华。目前已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振兴中华之时，研究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足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绝非不急之务，而是当务之急。此书不仅可以传世，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能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尤其是海内外客家人的高度重视。末了，谨以小诗一首祝贺此书的问世。诗曰：

中华儿女有客家，
客家根源在中华；
飘流万里根不断，
天下客家是一家。

1990年10月 于渝州

重庆师范学院

序二

丘菊贤

1989年12月，我有幸出席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成立暨世界客属联谊会。接着，又参加了大陆有史以来第一次客家问题学术讨论会，国内60多名客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构成，文化风貌、特点，以及客家人走向世界，历史贡献，弘扬客家精神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有意义的探讨。作为客家人我算是对自己的先人有了粗浅的认识，但还十分朦胧。1990年10月，“根在河洛”联谊会暨第二届河洛文化研讨会上，中外客家学者偶然的机遇，多位又在洛阳聚会，小组会上对客家问题又一次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对各自的观点寸步不让，自己很受启发。在这次会上结识了雷州师专副教授刘佐泉先生。

我本人由于专业和又是客家人的关系，长期也关心客家历史，平时也作些资料收集，亦发表过几篇客家问题的文章，但对客家许多问题望而却步，欲进不入，不得要领。这次在洛阳与刘先生相处的日子里，大都言及客家问题。刘先生关于客家问题一系列观点分析，使我顿开茅塞，大开眼界。我囑其写成文字，愿意协助出版，以活跃目前客家学之研究，开创客家研究的新局面。

会后不久，我收到刘先生洋洋40余万言《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书稿，端端正正，一丝不苟，议问题，娓娓道来，语言流畅，论述有序，头头是道，功底甚厚，可想刘先生平日之用心。他不愧为科班出身的客家学者。此后，个人夜以继日地拜读，以其说是审稿不如说是学习。此后，自己头脑中对许多客家问题在这通读刘先生书稿后得到冰释。对刘先生的大作用一句话来说，可说是个人所见及的中外客家研究专著中的佼佼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本客家问题专著。

只有详读其书方知著者之功力。

下面简介本书的几个特点：

一、搜罗广泛，言必有据。

众所周知，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必须囊括古今中外对自己探讨问题的前人、今人之成果，方可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纵观全书，刘先生所用专著、报刊、地方志达数百种之上。凡议一事，都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如援引《丰湖杂记》、《中华旧礼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客家人》、《客家源流研究》、《客家姓氏渊源》、《客家史诗》、《客家研究》、《梅州风采》等一系列客家专著。另又引各省、州、县之地方志，说明分支诸问题。如凡地方志有《嘉应州志》、《贵县志》、《信宜县志》、《陆川县志》、《惠州府志》、《博白县志》、《赤溪县志》、《广东通志》、《博罗县志》、《增城县志》、《浔州府志》、《兴宁县志》、《石窟一征》、《曲江文物志》等等。并涉猎国内外之报刊，诸如香港《嘉讯》、美国《源流》、《世界客总季刊》、《南洋客总会讯》、《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梅州《客家民俗》、《客家文化》、《广东侨务》、《嘉应乡情报》以及各学术杂志、大学学报和各地文史资料等。就是说，凡古今言及客家者，均在视野之内。这样谈起客家问题来，不唱高调、空调、大调，而是言必有据，不说门外话，使议论往高处、新处攀登。

二、立论公允，立己立人。

客家问题，众说纷纭。著者在介绍某一主题时，不是自持己说，一叶障目，一鸣惊人。而是先一一介绍古今中外诸说，最后才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议论，让读者选择，不强加某种观点给读者，给读者当向导。如，关于客家迁徙的原因，作者介绍了徐旭曾、罗元贞、罗香林、赖雨桐、李松庵等人的说法，并从分析封建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入手，阐明我国历史上人口迁徙因素包括人地

矛盾之因、战乱之因、贬谪之因、出任之因、游学从商之因、彼地优裕吸引之因，指出客家迁移是短期爆发迁移与长期缓慢迁移相结合的。强调中原战乱是主要推因，因为大规模的战争牵动全局，生产停滞了，生活失去正常的条件，为了生息环境，生存空间，外迁是必然的，因为南方条件优裕，决定了迁徙的方向。关于客家形成的时间，著者也不屈从众说，而强调在清代，并阐明了客家的方言，特别是民系自觉意识臻于完备，方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对秦汉说、西晋说、晋宋说、隋唐说、元明说都绝然否认，并罗列了各家说法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又如，关于客家称谓缘起，著者同样介绍了中外客家学者各种各样的说法即罗香林“给客制度”说、王力“外来”说、台湾陈运栋“客户”说、日本小川琢治“种族”说、台湾沙加尔“客户——主户”说、陈美豪“夏家”说、陈修“河洛”说等等。著者反对任何主观臆测，而是从中国移民历史的社会、经济、阶级诸关系中作历史的考察，弄清“客家”这一社会实体的含义。著者同意如下说法：客家是“不得不离开故乡的赤贫的人”（郭沫若语），他们是“占领山地，素无政治权利的人”（毛泽东语），被土民咒为“客作儿”（江西俚语）者，纯属佃户阶级属性，已摆脱晋末南来“世族”、“望族”的含义，从而作出“客家者，后来迁入并多充当佃客的北方南下汉人之谓也”的结论，认定“客家”一词最早不超过宋代。至于“客家”一词流行、准确的含义，著者是从17世纪地方志记载开始，特别是徐旭曾《丰湖杂记》这类似客家宣言的著作问世以后，因该文已明确论述了客家一些根本性问题。再如，关于客家国内外人数，著者介绍了十种说法后，他认为吴炳奎等先生的说法（见《客家民俗》1988年第4期）较切实近谱，自己采取这一说法即大陆约4056万、加台湾、港澳以及世界各国客家人，合共4700万左右。

总之，著者凡对有争议的客家问题，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强

加于人或强调己见，而是客观的以理服人的申述自己的见解。

三、结构严谨，论述有序。

著者在叙述客家历史时，紧紧地与国史结合，不至使客家历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源流清楚。几乎客家人几次南迁浪潮都放在中原动乱大框架中去作深入透辟的分析。清初客家人由原中心地区向四川、雷琼、台湾迁徙事件则与清初优惠移民政策联系起来。清中叶以后客家人一批又一批的走向世界又与洪杨太平军起义、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客家地区田少人稠、西方殖民者诱骗诸端综合观察、分析。同时，又结合客家本身的历史实际，将客家历史第一次作了历史分期，即前驱期、酝酿期、形成期和扩散期。这种介绍民族民系历史纳入国史框架之中，又不无视民系自身的特点，材料都定点到位，因果分明，繁而有序，条理清晰，让小系统融汇在大系统之中，使客家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又如，著者论及客家语言、风俗、歌谣、民居、精神等凡属文化范畴种种问题时，都费尽工夫、苦心，有意识地与古代中原文化联系起来，阐明客家文化根在中原，也介绍了演变中自己的特点。像客家山歌，既谈了与《诗经》十五国风类似的赋、比、兴的创作方法；也谈到迁移南方后，受南方民歌影响而形成的自己特点（七言四句，一、三、四句押韵等）。总之，由于此书结构谨严，论述有序，似无懈可击，可称得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部客家研究的学术专著。

四、传统文化，介绍详尽。

客家传统文化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就其性质而言，像我国古老的黄河文化一样，产生于古老久远的母体之中，与漫长的封建社会存在相连系，因而精华与糟粕兼存，包括着值得发掘、弘扬的部分和需要舍弃或批判认识的部分。本书对客家传统文化所有部分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包括客家民居建筑、语言、歌谣民

谚、信仰风俗、婚丧嫁娶、各姓谱牒等许多方面。光民居建筑一项，著者颇费笔墨言及屋场选择、建筑材料、营建结构、内部摆设和装饰、民居四周养殖等细节。又，著者为海外客家新一代了解客家人古老风俗，也介绍了客家祖塋建造、治丧、婚嫁礼仪以及生儿育女习俗。总之，一书在手，真可见及客家人千百来形成的种种文化风貌，肯定会受到国内外读者、尤以港台客家乡亲的欢迎。当然，著者也十分清楚，对一些客家文献（如族谱、家乘）和陋俗（如迷信风水、土葬等等）持批判的态度，一些地方已作画龙点睛之工夫。不过，上举陋俗，随改革进展，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也将永远成为历史。由于它属传统文化一部分，所以给予介绍。对于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部分（如客家精神、民居、山歌等），著者就作了更系统全面地介绍。

诚然，开拓之作均难免有缺点，况且著者是离乡背井数十年又在非客家地区的南疆边陲之地工作，故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再版时改进的。其一，书中缺乏足够的插图配合，使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加深读者对文中讲述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如介绍客家民居建筑，谈到“围龙屋”时，若能附上梅县白宫“联芳楼”围屋的照片，效果当然要好得多。其二，关于国史与客家史结合问题，此书当以客家史为重点，著者有时主次欠明，导致过冗长地介绍国史，而客家史显得粗略了（如讲唐中叶客家先民再次南迁，把安史之乱谈长了），重点没突出。这是比量问题，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其三，因印刷技术条件的局限，本书没有采用通常的页尾注释，而采用章节末注释，不便读者查对思考。同时，客家方言没有加注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不便非客家人阅读。

尽管本书有些小不足之处，有待再版时改进。但，瑕不掩瑜，纵观全书，仍不失为一部客家研究方面的力作，值得一读。

1991年3月于古城开封

河南大学

绪 论

中国素以人口众多称著于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次人口大迁移。中国人口移动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移民活动，从未间断，有众多如蚂蚁搬家的人群，一次又一次的背井离乡，突破了厮守田庐、耕读传家、安土乐业的传统观念，奔赴前景渺茫的异土他乡，甚至漂洋过海，泻向世界，散居各洲。

汉民族实在了不起，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民族生存能力的伟大，只要有一坯土，一瓢水，就能够活下去，繁衍生息，令人惊叹。也许正由于这许多次的人口大迁移，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和国外的华族、外籍华人群体以及华侨社会。我们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世界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和目前仍存在但已衰弱的民族，他们消亡和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的，社会的，或民族性格的影响。习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局限的空间里，从而缺乏向外去开拓新的疆土的动力，才酿成如许悲剧。所以，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人口大迁移，有助于人类的成长，民族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但对于迁移者自身来说是痛苦，甚至是悲惨的。在这种人口大迁移中就有“客家人”。

以粤、赣、闽交界的山区为中心、主要分布在南方各省(区)乃至海外的客家人，其先民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汉人。历史上的迁徙和僻处山地的环境条件，使他们形成了既是汉族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它既不同于半封闭的、凝固式的大陆文化，也异于展拓性、流动性的海洋文化；既不是那种为中原农耕定居的、以“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文化，也不

完全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工商文化；从文化圈的二重构造原理而言，客家文化位于中国文化模型的边缘位置，即内地通往南部沿海的要冲、枢纽地带，有着明显的边缘优势。在语言上，他们保留了古代中原汉语音韵，自宋代起形成了与北方和南方汉语均有差异的客家方言。在日常生活文化上，他们的住房采用围拢的合院形式，建筑取小型宫殿式。过去着俗装“唐装”的衣裤，男子以长衫为礼服，女子喜戴穿顶竹笠，周围缝上蓝布。其妇女也几乎“与众不同”——在清朝之前，不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乃至华南广东，妇女缠足是普遍现象，惟客家妇女历来不缠足，而且也不限于干“女红”之类的家务事，而是干种田、搬运等粗活，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劳动力。客家人重视祖先崇拜，建宗祠祖庙，春秋两季祭祖坟，迁移时背祖先骨骸同迁；节日有元旦、上元、二月二、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婚姻、礼俗多沿中原古时习尚，喜舞龙、舞狮。客家人有着崇尚文化，热心教育的良好传统，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历代涌现不少文人。客家山歌多七言四句，承受了《诗经》和唐诗的遗风。由于历史上客家人在迁移、定居的过程中曾与原住民发生冲突，导致客家人内部产生一定的内聚力。侨居海外的客家人多组成社团维系客家文化。有的地方还有只许客家人之间通婚的风习，表现了民系集团意识。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所说：“每当大乱之后，土旷人稀之地，必有客民侵入，乃古今之通例；迨至平承日久，腹地人满，则边塞荒寒烟瘴之区亦不远千里万里，移殖开辟，如清初之四川，清季之内蒙皆是，是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焉，广东之客家则异是。”不过，这种民系集团——方言群体意识从来没有越出自认为是汉族这个界限。

客家人历来不承认自己是非汉族，曾有过被误认为非汉族而

引起不满的事实：如外国人哀德尔（E·J·Eitel）就说：客家人“不与汉族同种”，客家话也不是汉族方言；有人甚至把客家人当作“少数民族”，说是苗族的一支，如《四会县志》就说：“客为疍”，《建设周报》“以榛狂加客人”；又有人把客家人看作是瓯越的子孙；又有人说客家人是在纪元前聚居在山东等地的“外来民族”等等。

为了弄清楚客家人和客家话的来源和属系，本世纪三十年代曾引起了一个研究客家的热潮，各种著作相继出现，有人从人口迁移史进行研究，有人从语言方面进行探索。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导论》以及尔后相继问世的《客家源流考》和《客家史料汇编》，古直教授的《客人对》，罗藹其先生的《客方言》等等。同时，还出版了《客人三先生诗选》、《客人骈文选》等“客人丛书”。从而得出的结论是：客家人是名符其实的中原汉族，客家话是汉语的一支方言，并且终于逐渐得到公认。

但，这仅是一个开端。正如罗香林先生在其集客家研究之大成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说：“这编导论只是报告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的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著名的文化史学家、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1936年在《临川音系》一书中曾提出彻底研究客家问题的设想。他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末，关于一部份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他看到了，客家研究是中华民族迁徙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怪乎当时便有人提议，把这门正在兴起的学问称之为“客家学”（Hakkaology）。

可是，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半个世纪以来，这门学问后继乏人，更无人倡导，一些分散零星的研究，多未能触及其基本问题，致使客家研究形同中断，遑论发展。甚至闹出了不少笑话和误会：1949年，上海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队伍中，

有许多少数民族的代表走在一道，各持旗帜，高呼口号，其中也有表明“客家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行列。1950年，《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报导发表了北京天安门举行“抗美援朝群众集会”的消息，其中就有“客家族代表某某讲了话”的提法。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作了更正，说明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客家族。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把《粤西北部客方言》、《审查客方言报告书》、《述客家方言之研究者》等论文编排在“少数民族语文”类中，把《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等十四篇有关客家研究论文均置于“各少数民族史”类的“南方及东南沿海民族”子目之下。直到1982年5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祖国各地”节目中，播出《访问足球之乡——梅县》一稿，谈到了客家人，最后称赞说：“表现了民族特色”。北方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客家人，有的还认为客家人是南方少数民族之一。就是客家人中对自己祖宗的来源也不甚了解。

客家研究的长期沉寂，并非说明研究的过时或走到尽头，而是发人深思，说明我们需要开拓与创新，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研究。

客家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份。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活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这样的民系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对开发长江、珠江和韩江流域，对繁荣东南地区，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影响深远。

为祖国的民主自由、独立解放与繁荣昌盛，万千优秀客家儿女，前赴后继，无私奉献，其辉煌业绩，惊天地而泣鬼神，彪炳于中国近现代史册。海外客属，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垦荒拓殖，勋业卓著；先贤时杰，有如群星璀璨，为同胞增辉。

客家文化具有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内聚性与拒异性、封闭性与开放性、民主性与封建性相结合的特点，并具有鲜明的移民和山区居民的色彩，在中华文化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诸种因素的影响，客家桑梓多数成为基础教育发达而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广东的贫困县就集中在客家地区）。这种畸型状况，既与近数十年来滥伐林木、水土流失、生态遭到破坏有关，更与人才大量外流、人口素质相对下降，互为因果、相互激化，使得今日客家步履维艰，难与现代化大趋势同步前进。振兴客家地区的经济文化，已不仅是客家人的强烈愿望，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心声。在开放改革突飞猛进的华南地区，客家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学课题。

客家研究，在大陆沉寂了半个世纪，近年方显振兴之势。而客家问题，涉及社会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周密系统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社会力量和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正如当年罗香林教授所说：“‘客家研究’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没法一手包办。以后这门学问能否‘发扬光大’，纯视一般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能否‘分工合作’。”

“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的历史与现实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我，身为客家人，作为从小在嘉应客家山村长大而又背井离乡数十年的史学工作者，对客家乡土、历史、文化是有深厚感情的，甚至形成了刻骨铭心的恋乡情结：即便我幼年、童年在家乡的生活是苦涩的，没有多少甜蜜可言，也并未影响我对故乡的挚爱和思念；即便是平常的客家风光和带有陈旧传统因子的乡风民俗，都觉得有浓郁的乡情。但，情感的东西毕竟不能代替理智的思考，情感的形式也无法将理性的本质完完全全遮掩住。因而，

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过去了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进行深情的反思。这种反思，力求从目前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历史高度出发，对客家先民先辈们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艰辛，所创造的业绩和客家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并力图探索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反思和探索的目的，是为了变革，为了开拓，为了前进，旨在促进客家精神素质的现代化，促使客家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向更高层次不断转化升华。它既不使人陶醉于过去的胜利，也不使人沉溺于已往挫折所带来的忧伤，而是引导人们把目光投向未来。于是，清理客家历史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便织成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亲驾小舟，犹在寻找源流，身临高山，还在觅取石头一样的愚不可及吧！诚然，舍弃陈说——不管是多么权威的陈说，探求新知，是科学研究本来的品格。因而，一部学术论著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在内容上是否有新的开拓，而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可信性。因此，秉着实事求是治学原则，力求达到言之有据，不作空泛推理，论证均以事实为据。在写作风格上，力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舍弃那种晦涩、艰深、堆砌概念的书斋气，注意了本书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写给作者的同行看的，而是写给海内外关心客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客家历史和文化的非专业读者看的。这些主观意图，能否达到？尚待客家父老兄弟姐妹、专家、读者检验。由于身处祖国南海之滨的非客家地区，资料搜集不易，学力见识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匡正。